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建设与管理探源

刘长宽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抗战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办学近九年,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大学”。西南联大图书馆在极其艰苦的岁月里,为联大师生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通过对西南联大图书馆的工作进行梳理,以期对现阶段我国大学图书馆的建设有所启示。

关键词: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抗日战争时期;图书馆建设;图书馆管理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识码:**A

在大学发展史上,图书馆历来被视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大学的心脏”。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湖南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并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全部迁往昆明并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其图书馆也相应地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

在战时特殊情况下,西南联大图书馆最大限度地搜集图书资料、提供高效的服务,为联大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中国图书馆史和中国教育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西南联大图书馆的组建、日常管理和历史影响,对促进我国大学图书馆建设与发展、提升大学办学质量有丰富的借鉴意义及启示。

1 西南联大图书馆藏书的主要来源

若说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那图书馆的心脏便是其丰富的馆藏。西南联大图书馆不遗余力搜集文献资料的举措和精神,对当今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西南联大图书馆馆藏资源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战争前后抢运出来的图书。联大图书馆成立之初,每名教师和学生平均占有图书量远远不及战前。清华大学安全运抵昆明的 23 000 余册图书除部分供本校自办的特种研究所使用外,其余皆

作为西南联大图书馆的藏书^[1]。在日本侵略军炸毁南开大学图书馆前,先期抢运出的 30 000 余册图书一部分被日寇劫走运往东京,剩余的 14 000 余册图书被运至昆明,陈列于西南联大图书馆^{[2]80}。

其次,开放办馆,吸纳图书。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与湖南国货陈列馆图书室订立了图书借阅办法,师生可凭本校阅览证在陈列馆图书室内阅览^{[3]84},还“向三和酒家租用阅览室一间”,拓展师生的阅读空间^{[4]45}。西南联大继承了长沙临时大学开放办馆的办法,与北平图书馆、云南大学等机构开展图书借用等合作。这开创了我国图书馆馆际互借、共享资源的先河^[5]。西南联大还实行过寄存图书的方法,即在图书馆没有某些必要参考书时,向有这些图书的师生借来供学生借阅,课程结束后,图书书归原主^[1]。

第三,科学规划,自行购置。在长沙临时大学第一次筹委会上便通过决议成立了图书设计委员会,由冯友兰、梁实秋等深孚众望的学者充任委员。到 1938 年初,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可以勉力支撑教学之需。在西迁昆明之前,长沙临时大学还特地召开了各系主席及图书设计委员会、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通过了添购图书的办法,并着手在广州和香港购买书籍。这种设立以著名学者为主体的图书设计委员会进行指导、集中相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民主议决图书购置的办法在西南联大得到了延续,使这所战时大学图书馆实现了可贵的

团结和高效率。

第四,积极吸纳国内外赠书。西南联大图书馆积极向国内外人士和各团体争取赠书。据1938年2月统计,在西南联大图书馆所入藏的6318种图书中,受赠图书比例达到了7.8%。现存的西南联大藏书,如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捐赠的《中国航权问题》等书中,都有赠书者的留言或者赠书函;也有很多书封面上有“先生赠阅 征书纪年”和“同学赠阅 征书纪年”等字样的章,表明这些书为西南联大师生所捐赠^[6]。此外,联大图书馆还接受了大量国外捐赠图书,如牛津大学一次捐书就达1454册,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捐赠了图书影片阅书机。

2 西南联大图书馆的管理模式

抗日战争前,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都很注重图书馆员的选聘、管理以及馆藏的扩充,注重图书馆日常工作的民主化和专业化。

协同共生的办馆理念值得我们借鉴。西南联大图书馆在继承三校图书馆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民主治理馆长负责制下的分职协作。西南联大图书馆的组织机构,起初是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合作组建的,由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兼任馆长。图书馆与总务处、教务处平行,直接隶属于联大常务委员会。1938年底,联大图书馆进行了改革,改馆长制为主任制,由严文郁任联大图书馆主任,隶属于联大教务处,从属其行政领导^{[3]90}。主任以下分列各股分别办事,每股设股长一人,由主任指派馆中职员一人兼充^{[4]95}。这实质上是馆长负责制下,各股分职,职员各负其责,既分工协作又融为一体的图书服务体系,是在人少事繁的条件下做好图书馆服务工作的组织保证。

具体而微的高效办事程序。西南联大延续了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的传统,图书仪器之设置,“请图书及理工设备二设计委员会及各系主席开联席会议拟定计划,交常务委员会核决”。这种慎重的办法,在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大中期以后,图书购置办法变为:图书设计委员会将经费按系科情况提出处理意见,经校常委会核准,分配到各系科;系科教员填写图书资料购置单,系主任签名后送交联大图书馆;图书馆采访股照书单采购,书籍到馆由编目股编目登录后送交有关图书室,并将购书情况告知各购书单位^[1]。这样的购书程序,增强了针对

性,保证了各系科对图书的需求。

民主决策,学者治馆。不管是联大的学术事业,还是行政领导,都充分体现了“教授治学”、“教授治校”的民主作风。在战时困难的情况,作为与西南联大学术拓进和日常教学关系密切的联大图书馆,自然也不例外。联大图书设计委员会的召集人和委员也都是由各系知名教授兼任^[7]。图书馆之重大问题,经图书设计委员会讨论,“拟定计划,交常务委员会核决”,由图书馆执行。即在实际上是校常务委员会通过教务处和图书设计委员会,对联大图书馆实行行政、业务的双重领导^[1]。

总馆为中心,分馆、图书室遍布全校。1939年夏天,西南联大在昆明大西门外的新校舍落成。自此,联大图书馆形成了以校本部总馆为中心,分馆、室遍布全校的放射型体系。“普通书籍及一般性质之书籍,普通参考书,均在总馆陈列、出借。其特殊性质之书,分置于各学院阅览室。各学系特别需要之书,由各系负责人负责向总馆借取后,置于系办公室,以供借阅。”^{[4]103}联大的图书馆系统分工明确,但又是一个有机高效的整体,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用各自需要的书籍。

3 西南联大图书馆的资源管理与服务

丰富的馆藏固然是大学图书馆综合实力的一个指标,但归根结底是要使这些浩如烟海的文献能有效地保证师生教学和科研所需。西南联大图书馆从实际出发、以师生需求为本、以科学管理为手段提供综合服务的理念,值得当今大学图书馆借鉴。

编撰馆藏图书目录,方便师生借阅。在分类编目工作中,西南联大图书馆坚持使用当时先进的分编方法。中文书籍采用刘国钧编的《中文图书分类法》分类,书次号用著者号,以万国鼎编的《著者号码表》为准编制,编有著者、书名、分类和排架四套卡片目录。西文书籍则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编有著者、书名、分类三套卡片目录,著者和书名目录按字母顺序混合排列^{[3]92}。图书目录包括卡片式和书本式两种。卡片目录置于阅览室目录柜中,以备读者及时查阅。限于书本式目录成本昂贵,只配有手抄本。联大图书馆还专门印制了《阅览指南》,详细介绍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及各种借阅手续。此外,联大图书馆借书出纳台处陈列有各种工具书以方便师生阅读^[5]。

延长阅览时间,严格借阅规定。西南联大中后

期规定,“本馆开馆大阅览室每日自早七时半至晚九时半,开放十四小时,并不间断。惟借用图书库藏书,则以校中规定办公时间为限。其他阅览室,除按照学校办公时间开放外,并加开夜馆。”西南联大图书馆还规定以馆内阅览为主,读者借阅前需“填写‘领书单’,连同‘入学证’”交纳管理员。联大图书馆还实行了“预约”借阅的办法,即在书籍或期刊“取得之后,可在阅览室阅读,每次借阅时间以四小时为限,四小时后如无他人需要,仍可再借,但须将书籍携至管理员处声明。”^{[4]99-100}一开一收之间,使更多的师生有机会阅读图书,提高了图书的利用率。

提供人性化服务,实施勤工助学。抗战期间,全国物价高涨,又“以昆明的生活费用最高”,教科书价格昂贵且不易买到^[8]。而西南联大规定如果必修科不及格,就不能升级选课;还规定除学年考试即毕业考试外,加考其以前各年级所习之专门主要科目共三种,不及格者不得毕业。鉴于此,联大图书馆颁行了“西南联大图书馆教职员借书规则”等规定,以使联大有限的图书产生最大的效益。联大图书馆还聘用学生管理图书、整理资料等。如西南联大图书馆师范学院分馆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就是由勤工俭学的学生负责完成的^[5],这既减轻了贫困学生的经济压力,又为他们提供了锻炼能力的机会。

充当第二课堂,发挥爱国民主堡垒作用。西南联大远不及战前三校的校舍优越,但是由于广大师生救国斗志昂扬,条件再艰苦也不忘苦读治学,馆舍较其他教学设施良好的西南联大图书馆俨然成为全校师生的“第二课堂”。联大图书馆及馆前广场常常成为举行各种典礼、讲演的场所。同时,西南联大图书馆也是联大师生进行爱国民主斗争的重要场所。1944年5月4日,联大举行以“五四与新文艺”为主题的文艺晚会,由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沈从文等人讲演,但由于到会人多,临时改于联大图书馆阅览室召开。1945年“一二·一”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四烈士棺木停放在图书馆大阅览室,死难烈士入殓仪式就是在联大图书馆前举行的^{[2]81-82}。

收集战争资料,注重社会教育。在图书馆日常业务之外,西南联大图书馆还与北平图书馆合作组建“中日战争史料征集会”,共同征集“抗战史料”。征集到的有关抗战的各种文献资料,保存于西南联大“中山室”,并对读者开放^{[3]93}。联大图书馆即便是在战时社会环境动荡、办学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也不忘进行原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不仅增加

了联大图书馆的馆藏数量,而且为开展抗战宣传和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源。西南联大还把服务的触角延伸到校外,利用假期空余时间为中学教师提供图书借阅服务^[6]。这些举措加强了西南联大与各中学师生的联系,也促进了当时昆明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的发展。

4 结束语

西南联大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战时的西南联大图书馆继承了战前三校图书馆的敬业精神、管理制度和服务理念,在图书资料极为有限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证联大教学、科研的正常需要,在中国大学图书馆史上增添了感人至深的一笔。中山大学程焕文先生在1992年概括出了“爱国、爱馆、爱人、爱书”的图书馆精神^[9],西南联大图书馆的办馆历程,可谓是对这一精神精彩演绎。西南联大图书馆的敬业精神、先进的服务理念以及高效的管理模式对当今高校图书馆的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 [1] 赵虹辉. 西南联合大学的图书馆管理[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 1988, (4): 70-73.
- [2] 南开大学图书馆大事记(1919.10~1999.3)[G]//南开大学图书馆编. 南开大学图书馆建馆八十周年纪念集.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9.
- [3] 吴晞. 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4] 王学珍, 郭建荣. 北京大学史料. 第三卷: 1937~1945 [G].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5] 王顺英. 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及其启示[J]. 图书情报工作, 2011, (11): 48-51.
- [6] 王顺英. 解读西南联大图书馆的创新服务[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08, (6): 137-138.
- [7] 姚加惠, 张亚群. “强强联合”的成功典范——西南联大管理模式及其成因探析[J]. 现代教育科学, 2004, (2): 34-37.
- [8] 光德正. 联大工学院生活追忆[M]//王德硕, 光德正, 等.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台北: 南京出版有限公司, 1981: 209-210.
- [9] 程焕文. 图书馆人与图书馆精神[J].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2, (2): 35-42, 93.

(收稿日期: 2012-09-14 责任编辑: 张静茹)